



清末维新派人物致 山本宪书札考释

The Research Notes for Late Qing Reformers' Letters
to Yamamoto Ken

吕顺长 著



1/256.5
24

清末维新派人物致 山本宪书札考释

The Research Notes for Late Qing Reformers' Letters
to Yamamoto Ken

吕顺长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着重对日本汉学家山本宪后人所保存的清末维新变法派人物致山本宪的一百二十余通书札进行整理和研究,包括解题、书札影印、书札录文、书札考释等部分。这些书札记录了清末多位维新变法及其相关人士所进行的诸多活动,以及他们对当时所发生的多起重大事件乃至周围的生活琐事之看法和感受。本书内容不仅可对维新变法运动之研究作重要的资料补充,还涉及近代中日两国知识阶层交往之历史,反映了错综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侧面,折射出甲午战后两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种种心态变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吕顺长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13-17209-9

I. ①清… II. ①吕… III. ①百日维新一史料②百日维新一历史人物—书信集—中国—清后期 IV. ①K256.506②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9238 号

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

著 者:吕顺长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郑益慧

印 制: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457千字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7209-9/K

定 价:15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26.5

印 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9815625

序

吕顺长教授的新著《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付梓在即，在此谨允许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2012年，我主持申请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研究课题“从‘山本宪关系书简’中的康有为族兄康有仪等人的书信看近代日中交流史之特征”（课题编号 JP23320151，基盘研究〈B〉，平成二十三至二十七年度）获得通过，2017年2月其研究成果《变法派之书简与〈燕山楚水纪游〉》在日本汲古书院顺利出版。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吕顺长教授在对“山本宪关系资料”中的中国人书信的解读、翻译和分析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涉及这一课题研究成果中书信部分的约三分之二内容。

众所周知，吕顺长教授已出版了《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等学术专著，可谓该研究领域的专家。笔者此次被邀为本书作序，虽深感不够资格，但念及吕教授这些年来对我所主持的课题的支持，不妨容我借此机会对我们的共同研究课题，包括成为共同研究契机的“山本宪关系资料”的内容作一介绍。

本书书名中出现的山本宪（1852—1928），字永弼，号梅崖，日本近代文人，出生于高知县佐川町，晚年则在冈山县牛窗度过。对山本宪其人，大约至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学界有人认为他是日本近代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家（如间岛永太郎著《一位忧国者的面容》，1988），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努力向中国学者提供日本及西洋书籍译作的翻译家（如远藤光正《山本梅崖所见的日清战争后的中国——以〈燕山楚水纪游〉为中心》等，《东洋研究》第82号，1987），但更多人则认为他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如三浦叶著《明治之硕学》之《川田雪山谈山本梅崖先生》等，汲古书院，2003）。虽诸说不一，但这恰好反映了其生前活动的不同侧面。

约从2000年前后开始，有关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中日民间交流之研究进一步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中国国内的重要研究著作，如王晓秋先

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本田知生译,东方书店,2000)等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研究者所开展的如对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维新变法派人物与日本学界、政界的交流等研究,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狭间直树编的《共同研究 梁启超》(みすず书房,1999)和丁文江、赵丰田编,岛田虔次编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岩波书店,2004)。在这一过程中,山本宪的活动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如狭间直树在《初期亚洲主义的历史考察(7)关于善邻协会及冈本监辅》(《东亚》第416号,2002)一文中就论及了山本宪与梁启超任主笔的《清议报》以及与汪康年的关系。另外,狭间教授在新著《梁启超 东亚文明史之转换》(岩波书店,2016)、《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等著作中,则根据吕顺长教授的研究成果,对山本宪的活动进行了介绍。

有关山本宪的史料,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就已先于日本有所介绍,这就是变法派人物汪康年遗留的书信中所包含的15通山本宪书信(《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最早利用这一资料对汪康年与山本宪的交流进行实证研究的是吕顺长教授的论文《山本梅崖与汪康年之交游》(《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纪要》第45号,2008)。我最初接触吕顺长教授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时候。

但是,从山本宪方面看,寄给他书信的变法派人物并不止汪康年。

2006年5月,山本宪遗族将六千多件资料寄托给了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其中不仅包含了梁启超、康有为、汪康年、王照等中国清末维新派人物的亲笔书信,而且还有山本宪汉学塾“梅清处塾”的门人、后来为亡命日本的维新派人物居中联络的康有为族兄康有仪的大量书信,另外还有与变法派相关的一些日本人的书信,总数达250通以上。

山本宪在生前曾向家属表示希望妥善保存自己的遗物。他去世后,其以汉籍为中心的藏书于1929年捐赠给了冈山县立图书馆,该馆还专门设立了“山本文库”。遗憾的是,1945年6月的空袭使该图书馆毁于一旦,山本宪的藏书也全部化为灰烬,现所存者仅其藏书目录而已。而保存在遗族家中的资料和遗物,在山本宪养女山本信女士(兵库县姬路市)及其长女(山本宪外孙女)山本和子女士的不懈努力下,一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后来,山本和子女士为了将山本宪遗留的资料寄托给山本的出身地高知县的相应机构进行了多方努力,而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为接管这些资料想必也克服了重重困难。现在,这些资料及其研究成果能在日本和中国公开刊行,与山本宪遗族的努力及当时决定接管这些资料的自由民权纪念馆西田幸人馆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此再次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最初安排西村氏和依光贯之氏对这些资料进行初步的整理,后来则以高知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公文豪氏为中心,在该馆资料整理员泽村美乃氏等人的配合下,开始了系统全面的整理。此时,在公文豪氏的邀请下,我参与了资料的整理工作。

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将这些资料称作“山本宪关系资料”,并于2011年刊行了整理成果《山本宪关系资料目录》。以后,此目录成了有关山本宪资料研究的基本工具书,我自身也曾以此为线索,对梁启超、康有为等清末变法派等人物的亲笔书信、信封、名片、照片等进行确认,从中得知“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与日本人交往和活动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我着手对其中的汪康年书信进行分析,探明了《汪康年师友书札》所收的15通山本宪书札与“山本宪关系资料”所收的汪康年书札的相互关系,并发表了论文《清末变法派人士汪康年致山本宪之书简——兼论〈山本宪关系资料〉之史料价值》(《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纪要》第16号,2008)。此外,《史学杂志(2008年)回顾与展望(中国近代)》(小羽田诚治)一文中,也将“山本宪关系书简”作为“值得特别关注的私藏史料”作了介绍。

后来经过调查得知,“山本宪关系资料”尤其是其中的维新派书信,是以往中国大陆和台湾均未见的珍贵史料,这使得相关人员开始意识到完好保存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如果能将这些资料拍摄下来,不仅能永久保存,而且能为更多的研究者所利用,使研究进一步深化。为此,笔者向日本学术振兴会申请了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研究项目,以期对这些资料进行拍摄和开展共同研究,结果顺利获得通过。

课题申请通过后,我们请专业公司“四国工业写真株式会社”(高松市)进行了拍摄,通过数字化处理技术,使一些肉眼难以辨认的文字也得以“复原”。此后4年间所拍摄的资料累计达146件约9000张图片。现在,在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这些已拍摄的资料在标明了资料所有者、保管者和拍摄责任者的基础上,已刻录成光盘资料保存,并提供给研究者利用。

我们的共同研究课题“从‘山本宪关系书简’中的康有为族兄康有仪等人的书信看近代日中交流史之特质”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尽最大力量对相关资料进行解读、翻译和注释,并撰写解题;二是搞清山本宪在与中国人的交流、自由民权运动、日本及西方文献的翻译、汉学教育等方面的活动状况,并探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叶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历史特征;三是对山本宪的汉文游记《燕山楚水纪游》(山本于1897年9月23日出发,12月1日归国,期间访问了北京及周边地区、长江流域的多个城

市)进行翻译、注释和撰写解题(蒋海波解题、翻译、录文,狭间直树监译)。因为上述书信中的发信人有许多是山本宪 1897 年游历中国时曾有过交流的人物,书信的一些内容与此游记密切相关。

由于我自身的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世史,加之“山本宪关系资料”的书写字体几乎均为行书或草书,录文和解读必有不少困难。为此,我在当初确定共同研究计划时,便邀请对康有仪书信已有研究的吕顺长教授加入,吕教授尽管工作繁忙,但还是欣然应允。

吕顺长教授以书札分析为中心,通过对书札所作的独自研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为推进这一共同研究项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吕教授为此课题所做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为根据康有仪书札等资料对《佳人奇遇》译者所作的考证。众所周知,东海散士(柴四朗)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向来被认为是梁启超翻译后于《清议报》(主笔梁启超,1898 年创刊)连载的中国最早的汉译政治小说。对此,吕顺长教授通过 1899 年 1 月 11 日康有仪致山本宪书简中有关康有仪翻译《佳人奇遇》4 篇等记载进行考证,结合康有仪回国时间与《清议报》终止《佳人奇遇》连载时间基本相同等事实,认为康有仪直至回国,始终进行了该小说的翻译。此外,通过康有仪的居中联络,山本宪本人曾为《清议报》提供了数篇稿件,其塾生也为该报翻译了不少稿件。

另一重要成果是通过康有仪的书信,进一步究明了当时横滨大同学校的一些具体状况。康有仪在横滨期间,不仅为《清议报》的刊行做了许多工作,而且还曾兼任大同学校的教员。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较多注意该校校长徐勤以及推荐徐勤等人参与该校工作的康有为,而通过康有仪的书信,我们可以了解横滨大同学校创设当初的状况以及校长徐勤等相关人员的活动情况。

此外,吕顺长教授的研究还指出:康有仪与山本宪还计划通过日文书籍翻译西洋人所著的有关孔子的书籍,以期将西洋人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认识,以日本为媒介介绍到国内;而这一翻译计划或许给维新派人物的孔子观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这些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以及吕顺长教授绵密细致的实证研究手法,读者诸君均可在本书中得到确认。

总之,吕顺长教授在为我们的共同研究作出诸多贡献的基础上,对维新变法派人物的书札进一步开展了独立的研究。本书可谓是其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

我相信,通过吕顺长教授的不断努力,“山本宪关系资料”今后定将为更

多的中国研究者所利用,这一资料作为研究近代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史料,也将为更多人所认识。

最后,再次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

日本高知大学 吉尾宽

2017年4月25日

(王婷 译)

前 言

近代中日关系,可谓错综复杂。对近代日本而言,从明治初的武力侵台,到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日俄战争、“二十一条”要求、“九·一八”事变,直至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始终是其最重要的掠夺和侵略目标。但是,即便是在两国充满对立甚至硝烟弥漫的时代,中国仍以惊人的勇气和现实的态度,试图通过向古来之“弟子”、甲午之劲敌学习,以实现富国强兵之梦。可以说,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日本起到了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1871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两国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如此,日本却凭借日益强大的国力,开始试图侵占琉球群岛,并以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公然以武力侵略台湾。诚如李鸿章所言:“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①日本的崛起,使国人开始意识到它已成为中国新一轮威胁的策源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这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震撼,是历次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所无法相比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因此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更重要的是,耗巨资历数十年致力于洋务的“天朝上国”败给的不是“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而居然是新崛起的日本,国势之衰弱、政府之无能,彻底暴露无遗。甲午战败,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促使有识之士开始分析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并由此掀起了学习、研究日本的高潮。

甲午战后,商贾旅人、考察官员、外交使节、教习学人等,往来于中日两国间的人员迅速增加;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派主要人物流亡日本;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以海外中国人为主体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日俄战争后,中国留日学生剧增并使近代中国的留日运动达到高潮;清末中国,以留日学生为主体,从日本翻译引进了大量的教育、科技、文

^① 《李鸿章全集》(二)奏稿卷二十四,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33页。

化类书籍。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密不可分。虽然本书的重点并不在于对这些问题直接进行研究,但书中所收录的维新变法派人物致日本汉学家山本宪的书信及对此所作的考释,其内容不仅可对维新变法运动历史之研究作重要的资料补充,而且还涉及了近代中日两国知识阶层交往之历史,反映了错综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侧面,折射出甲午战后两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种种心态变化。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先后逃亡日本,与先前赴日的康有为族兄康有仪、弟子徐勤等齐聚东京。日本汉学家山本宪通过就读于其私塾的康有仪与康梁等人接触,并通过各种方式极力给予援助,此后双方还以书信等形式保持了较长时间的交往。虽然山本宪致康梁等人的书信大多已散佚^①,但康有仪、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汪康年等人致山本宪的书信一直被山本遗族保存,并于近年公诸于众。

19世纪80年代,作为汉学家的山本宪在经营其位于大阪的汉学塾“梅清处塾”之余,还作为自由党党员参与有关自由民权运动的言论活动,并参与了1885年发生的所谓“大阪事件”^②。在该事件中,山本宪因起草了檄文《告朝鲜自主檄》等而以“外患罪”被判入狱,后于1889年因日本颁布首部宪法而被特赦释放。在此檄文中,山本称朝鲜本为独立自主之国,却被清国夺去国权沦为属国,并指责清国人“犬羊为性,蠢若豚彘,顽冥弗灵,倨傲诞慢”^③。如此言论,与其说是指责,不如说是谩骂。

但是,变幻的时势可谓与山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他虽曾对中国如此不怀好感,但在目睹中国甲午战败后遭日本及欧美列强瓜分的惨状后,开始对中国寄予同情。1897年末,他只身一人游历中国,不仅观赏山水风光,还广交名士,希望与中国有识之士共同商讨防御外侮之策。回国后不久,其汉学塾接纳了近代中国最早从国内学堂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并与刚结识的汪康年等人进行书信交流。戊戌政变后,他还多方奔走援助流亡日本的维新派人物,甚而多次或面见或致函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当时日本政要。对此,康有为曾作诗称:“高士山本子,遗经抱器器。吾兄从之游,陈义不可翹。慷慨哀吾难,奔走集其僚。……感子蹈海情,痛我风雨憐。”^④其对山本的感

① 除《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收录山本宪致汪康年的书信15通外,其余未见。

② 是指以大井宪太郎为中心的自由党左派策划朝鲜内政改革最终败露的事件。策划者企图支持朝鲜改革派,让独立党掌权,进而以此为导火线挑起日清战争,趁乱颠覆日本的藩阀政府。但在行动前计划败露,139人在大阪等地被捕。

③ 山本宪:《梅崖先生年谱》,非卖品,1931年,第20页。

④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7页。

激之情充满于字里行间。

笔者自 2008 年撰写《汪康年与山本宪的交游》一文开始,对山本宪与汪康年、康有仪等人的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并从 2011 年开始整理日本新近发现的汪康年、康有仪、梁启超、康有为等人致山本宪的书札。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受高知大学吉尾宽教授的邀请,参与了由他主持的“从《山本宪关系书简》中的康有为族兄康有仪书札看近代日中交流史的特质”这一课题的研究,获得许多启发。期间,还曾多次访问位于冈山县牛窗町的山本宪故居、山本宪的出生地高知县佐川町等,向当地居民打听山本宪的事迹。但遗憾的是,对于山本宪其人,当地住民大多连连摇头称从未听说,甚至从山本后人手中购得山本故居后现居住其中的住户,也不知该房屋从前的主人。山本宪可谓是近代日本尤其是关西地区较为重要的汉学家,其著作有近二十种,其晚年所著的《论语》研究著作《论语私见》可谓其学问之集大成。尤其是他与维新变法派人物的交往,对康梁等人在日本的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山本宪虽非圣贤,但对比其在当地所受到的冷遇,不禁令人联想起李白“古来圣贤皆寂寞”的诗句,并为之感叹。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同时作为一个致力于山本宪与清末中国人之交流的研究者,每次访问其晚年居住过的海边小镇和出生地的偏远山村,或发现山本题写的碑文,或辨认居民家中所藏的山本题写的诗词,或向地方史研究者了解有关山本的事迹,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动。这些感动逐渐化作一种责任:让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山本宪事迹重新为世人所知,将山本后人一直珍藏的有关维新派人物的书信介绍给国内学界,为更多的人所利用。

本书作为笔者近年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着重对山本宪后人所保存的清末维新变法派人物致山本宪的书札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包括解题、书札影印、书札录文、书札考释等部分。解题部分,着重对与收录书札相关的主要人物和背景、书札的主要内容和史料价值进行解说,内容包括山本宪及其中国漫游、康有仪与山本宪的交往、康有仪和梁启超与《佳人奇遇》的翻译、书札主要内容介绍等;书札影印部分,在获得资料所有者对该资料的影印出版许可的前提下,以影印的方式收录了康有仪书札 82 通、梁启超 8 通、汪康年 19 通、康有为 8 通、王照 6 通、徐勤 1 通、山本宪 3 通,计 127 通。书札录文部分,分别对以上影印书札逐一进行解读,并根据文意予以标点;书札考释部分,在对以上书札中的人名、地名、书籍名等以脚注方式加以注释的基础上,对书札中所涉及的重要事件等以按语的形式进行了考证和说明。

本书不仅可为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史料,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试举数例:

(1) 汉学家山本宪以 1897 年游历中国为契机,与汪康年、梁启超等一大批中国文人志士开始密切交往,他在大阪创办的汉学私塾接受了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在康有为等维新变法派人士流亡日本后又给予诸多援助。山本宪为近代中国诸多文人志士了解认识日本,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2) 被认为是梁启超最早翻译作品的《佳人奇遇》,作为中国最早的汉译政治小说,在中国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本书在对有关《佳人奇遇》之译者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根据书中所收录的康有仪书札中与此相关的史料,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指出以往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最终得出结论:《清议报》所登载的《佳人奇遇》,其翻译者是康有仪,而不是学界向来所认为的梁启超。

(3) 梁启超与山本宪于 1897 年末在上海相识,亡命日本后数次于东京和大阪相见。梁启超通过笔谈和书信等方式对山本宪通过设立“日清协和会”、直接上书日本政府等形式援助流亡日本的维新变法派人物表示感谢,同时表示维新党人虽“惟有举周勃、徐敬业之义”,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援助,反映了梁启超等希望借助日本政府及民间的力量改变国内政治状况的幻想。梁启超曾希望山本宪提供有可能给予援助的相关人士的名单,山本宪则至少提供了胜海舟伯爵、近卫笃磨公爵、副岛种臣伯爵、曾根俊虎、谷干城等重要人物的信息,可知山本宪对康梁等人流亡日本后的活动有过较大影响。

(4) 通过对王照书札的考察,究明了王照信函中所抄录的政变发生前光绪帝的两道密诏,其部分内容与以往所见的不同,可视为经康有为篡改后的另一版本;王照在日本期间的言行多有缺乏原则、自相矛盾之处,如与康梁划清界线、表明自己未曾指责慈禧太后之短、为索要金钱而向康有为献媚等,其目的或与自保和摆脱困境有关。

(5) 通过对曾就读于山本宪梅清处塾的留日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人的赴日经纬、留学经过等方面的研究,指出:除 1896 年驻日使馆从国内各地招致的 13 名特殊学生外,1897 年从杭州蚕学馆派遣的浙江官费留学生汪有龄、嵇侃,是中国近代从国内学堂派遣的最早的留日学生。

本书撰写过程中,尽管已对书札录文进行了多次确认,但误读之处估计在所难免,对部分固有名词和事件的考释可能存在不够全面之不足,有些观点或许还欠成熟。衷心期待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吕顺长

2016 年 4 月

目 录

解题	1
----------	---

书札原件与考释

康有仪书札	35
康有仪书札一(1898年7月)	35
康有仪书札二(1898年7月)	39
康有仪书札三(1898年7月20日)	41
康有仪书札四(1898年7月22日)	43
康有仪书札五(1898年7月23日)	45
康有仪书札六(1898年7月28日)	47
康有仪书札七(1898年7—8月)	49
康有仪书札八(1898年7—8月)	50
康有仪书札九(1898年7—8月)	51
康有仪书札十(1898年7月)	53
康有仪书札十一(1898年8月5日)	55
康有仪书札十二(1898年7—8月)	58
康有仪书札十三(1898年8月11日)	60
康有仪书札十四(1898年8月13日)	64
康有仪书札十五(1898年8月)	66
康有仪书札十六(1898年8月)	68
康有仪书札十七(1898年8月18日)	72
康有仪书札十八(1898年8月20日)	74

康有仪书札十九(1898年8月22日)	76
康有仪书札二十(1898年8月24日)	78
康有仪书札二十一(1898年8月24日)	80
康有仪书札二十二(1898年8月26日)	82
康有仪书札二十三(1898年8月)	84
康有仪书札二十四(1898年8月28日)	85
康有仪书札二十五(1898年8—9月)	87
康有仪书札二十六(1898年8月30日)	89
康有仪书札二十七(1898年8月31日)	91
康有仪书札二十八(1898年8月31日)	93
康有仪书札二十九(1898年8月)	95
康有仪书札三十(1898年8月)	97
康有仪书札三十一(1898年8月)	99
康有仪书札三十二(1898年8月)	101
康有仪书札三十三(1898年8月)	103
康有仪书札三十四(1898年8月)	105
康有仪书札三十五(1898年7—8月)	107
康有仪书札三十六(1898年7—8月)	109
康有仪书札三十七(1898年8月)	111
康有仪书札三十八(1898年9月1日)	113
康有仪书札三十九(1898年9月1日)	115
康有仪书札四十(1898年9月6日)	117
康有仪书札四十一(1898年9月21日)	119
康有仪书札四十二(1898年9月27日)	122
康有仪书札四十三(1898年9月28日)	125
康有仪书札四十四(1898年9月30日)	128
康有仪书札四十五(1898年10月1日)	130
康有仪书札四十六(1898年10月)	134
康有仪书札四十七(1898年10月12日)	136

康有仪书札四十八(1898年10月)	139
康有仪书札四十九(1898年10月)	141
康有仪书札五十(1898年10月)	142
康有仪书札五十一(1898年10月)	144
康有仪书札五十二(1898年11月16日)	146
康有仪书札五十三(1898年11月)	149
康有仪书札五十四(1898年11月24日)	152
康有仪书札五十五(1898年12月8日)	156
康有仪书札五十六(1898年12月11日)	158
康有仪书札五十七(1898年12月14日)	160
康有仪书札五十八(1898年12月18日)	163
康有仪书札五十九(1898年12月30日)	168
康有仪书札六十(1899年1月6日)	171
康有仪书札六十一(1899年1月11日)	175
康有仪书札六十二(1899年1月20日)	180
康有仪书札六十三(1899年1月26日)	184
康有仪书札六十四(1899年1月28日)	187
康有仪书札六十五(1899年1月30日)	191
康有仪书札六十六(1899年2月3日)	194
康有仪书札六十七(1899年2月9日)	199
康有仪书札六十八(1899年2月27日)	202
康有仪书札六十九(1899年3月2日)	204
康有仪书札七十(1899年3月7日)	206
康有仪书札七十一(1899年3月30日)	211
康有仪书札七十二(1899年4月2日)	215
康有仪书札七十三(1899年4月23日)	217
康有仪书札七十四(1899年5月4日)	219
康有仪书札七十五(1899年5月24日)	221
康有仪书札七十六(1899年6月1日)	225

康有仪书札七十七(1899年9月2日)	228
康有仪书札七十八(1899年10月28日)	231
康有仪书札七十九(1900年1月4日)	234
康有仪书札八十(1900年1月25日)	238
康有仪书札八十一(1900年3月22日)	242
康有仪书札八十二(1900年11月8日)	245
梁启超书札	249
梁启超书札一(1898年10月29日)	249
梁启超书札二(1898年11月3日)	252
梁启超书札三(1898年12月8日)	259
梁启超书札四(1899年5月25日)	263
梁启超书札五(1899年6月3日)	266
梁启超书札六(1899年6月17日)	270
梁启超书札七(1899年9月4日)	272
梁启超书札八(1901年11月17日)	274
康有为书札	276
康有为书札一(1898年7月19日)	276
康有为书札二(1898年10月29日)	280
康有为书札三(1898年10月)	282
康有为书札四(1898年11月12日)	286
康有为书札五(1898年11月25日)	289
康有为书札六(1898年12月)	291
康有为书札七(1899年2月3日)	293
康有为书札八(1899年2月8日)	295
王照书札	298
王照书札一(1898年10月)	298

王照书札二(1898 年 11 月)	303
王照书札三(1900 年 2 月 13 日)	309
王照书札四(1900 年 3 月 25 日)	312
王照书札五(1900 年 4 月 7 日)	316
王照书札六(1900 年 5 月 28 日)	318
 徐勤书札	 321
徐勤书札(1898 年 9 月 30 日)	321
 汪康年书札	 323
汪康年书札一(1897 年 11 月 22 日)	323
汪康年书札二(1898 年 1 月)	325
汪康年书札三(1898 年 2 月 5 日)	327
汪康年书札四(1898 年 6 月 8 日)	329
汪康年书札五(1898 年 7 月 28 日)	331
汪康年书札六(1898 年 10 月 3 日)	334
汪康年书札七(1898 年 10 月 21 日)	336
汪康年书札八(1898 年 11 月 12 日)	338
汪康年书札九(1900 年 10 月 8 日)	340
汪康年书札十(1901 年 1 月 18 日)	343
汪康年书札十一(1901 年 3 月 5 日)	345
汪康年书札十二(1901 年 9 月 13 日)	347
汪康年书札十三(1902 年 1 月 17 日)	349
汪康年书札十四(1903 年 5 月 8 日)	352
汪康年书札十五(1903 年 9 月 29 日)	355
汪康年书札十六(1905 年 9 月 11 日)	357
汪康年书札十七(1907 年 9 月 24 日)	361
汪康年书札十八(1908 年 12 月 15 日)	365
汪康年书札十九(1909 年 3 月 13 日)	369